

# 北欧学界对东方现代文学的译介：评述《文学史：全球视角》

宋达

**摘要：**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身份构成中可看出，东方文学在 1990 年代之前是不被北欧重视的，哪怕北欧的亚洲学和非洲学研究颇有成就。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重视东方文学的状况也正在改变：北欧学界在重建世界文学史观和结构过程中，试图把原本区域性的东方文学纳入整个世界文学框架下来考察。本文通过研究瑞典国家学术委员会耗时近十年的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史”及成果四卷本《文学史：全球视角》，讨论北欧学界如何重新认识东方文学以图改变世界文学史结构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 北欧学界 阿拉伯和非洲文学 东亚文学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北欧作为欧洲的一个部分，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基于北欧自身的共同性，越来越参与对世界的建构，包括对东方的重新认知。而对东方文学的再认识，成为这个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及北欧知识界近 20 年来改变东方文学认知的情况，且不论北欧诸国学界关于东方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变化历程、东方各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情况、北欧和东方各国文学家交流、研究和翻译所产生切实效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加大对东方文学的关注)等，仅世界文学史建构中的东方文学比重变化而言，瑞典国家学术委员会联合北欧学界耗时近十年(1996-2004)的项目研究“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史”(*Litera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 in Global Contexts*)及成果四卷本《文学史：全球视角》(*Literary History: Towards a Global perspective*)，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事件：检讨西方和北欧对东方各区域文学的地域性研究史，并对比西方的文学观和文学史研究，跨越空间和文化界限讨论文学观念、文类、文学互动等问题，显示出北欧在重建世界文学史结构上突出东方文学的趋势。

为何北欧能出现这样的变化？国际现代语言文学基金会秘书长、瑞典乌梅亚(Umeå)大学瑞典语言文学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彼得森(Anders Pettersson)《文学的诸种概念和跨文化的文学史》(2006)深刻论说道，“在西方，文学史研究从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就开始了——包括欧洲各国文学史、作为整体的欧洲文学史，以及至少从 1930 年代以后的世界文学史。早在 19 世纪初，就有相当可观的类似的世界文学史著作问世。这类著作多为优秀专家写就，作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也极富价值”，但这些文学史著述，无论是德国学者克劳·冯·西(Klaus von See)主编 24 卷本德语版《文学研究新手册》(*Neues Handbuch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1972—2002*)，还是苏联科学院版《九卷本世界文学史》(*Istorija vsemirnoj literatury, 1983-94*)，或是赫特尔(Has Hertel)联合北欧学界(以丹麦为主)编纂的七卷本斯堪的纳维亚语《世界文学史》(*Verdens litteraturhistorie, 1985-1993*)等，无不存在这四方面问题，即“1，各种作为文化存在的文学在地理分布上比例很不均衡。西方文学(欧洲语言创作的文学)在整个文学世界分布版图中占据了约 80% 的比重，而其他各国文学则只能共分剩下的 20%(这仅有的比例还要除去跨文化综述部分)。2，这类成果探讨了不同区域文化：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以及西方的文学，但整体上，这些研究只是将这些文学描述为不相干系的独立体，彼此之间的联系并

未分析。3，不同文化发展的情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随着其自身的观念体系和研究视角而运行，人们看不出这类研究中协调一致的观点——举个简单的例子，涉及到文本类的地方都没有使用统一的术语。4，尽管文学观对于这些研究是核心关键，但文学观念本身总体上并未得到解释。实际上，文学观视讨论的时代和文化的不同而赋予了迥异的外延”，对此作者批评说，“设想一幅按相似原则构成的世界版图，这张地图并不包含世界的主要内容有机构成，而仅仅是一系列的地图连接而已”，过往的欧洲人所著世界文学史就是如此不完整，因而要深刻反思总结欧洲人的文学史研究历程，揭示这些文学史构成背后的观念，正视欧洲文学概念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文学’，当运用于不符合现代西方样式的文学现象时，就具有了不同的且更为宽泛的意义”<sup>190</sup>。也正因要深入检讨过往欧洲知识界关于文学史研究问题，并反思世界文学史观，给重建世界文学史提供理论的可能性依据，凸显翻译东方文学的重要性，北欧学界就试图在世界文学史结构中凸显东方文学。

对东方古典文学的译介，并纳入世界文学史框架重新审视，自然是北欧学界译介东方的重要步骤。此其一，其二：随着现代化进程席卷东方，东方被纳入世界化进程，殖民化和去殖民化历史逐渐成就了东方的族裔意识、民族主义诉求和民族解放潮流、对西方文化的(后)殖民批评态度等，东方文学也相应的发生现代转型问题，这些更为北欧学界关心的话题。

其中，阿拉伯-非洲的被殖民化进程促成阿拉伯觉醒运动(*annahda*)，促使其知识分子重估阿拉伯和欧洲之关系、各种形式的欧洲现代性和阿拉伯文学之关系。这种情形，自阿拉伯民族主义史学奠基人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1891-1941)这位出生于黎巴嫩-埃及一个信奉希腊正教的阿拉伯知识分子之作《正在觉醒的阿拉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故事》(1938)就开始了。由是，豪姆博格根据黎巴嫩学者苏莱曼(Sulayman al-Bustani, 1856-1925)所译《伊里亚特》(1904年开罗出版)，著文《文化移译史诗：阿拉伯觉醒和<伊里亚特>的翻译》(2006)讨论阿拉伯如何接受欧洲文化问题：18世纪阿拉伯出现支持和赞助翻译西方经典的运动、拿破仑征战到埃及后大力推广欧洲文化，但因翻译者大部分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叙利亚的基督徒或波斯人，缺乏把西文诗歌翻译成阿拉伯语的知识，而阿拉伯译

---

<sup>190</sup> Anders Pettersson, *Concepts of Literature and Transcultural History* // vol.1: *Notions of Literature across Times and Cultures*, pp.1-35.

者更感兴趣的则是西方医学和哲学文本，外加荷马史诗世界的审美神奇性及其诸神元素之于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而言是严重的障碍，导致阿拉伯人 18-19 世纪没有翻译这类作品。故，苏莱曼这个有许多注释、译者导言达 200 页的译本，是阿拉伯人接受欧洲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在此，作者仔细辨析译本并对照原文，论述这个译本是如何把欧洲的思想、概念、行文方式等转化为阿拉伯读者可接受的表达(如改造阿拉伯语传统表达方式、引进西方术语)，尽力让西方言说与阿拉伯审美对接，使国民更好接受欧洲经典，哪怕整个翻译深受阿拉伯诗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没妨碍“这是阿拉伯传统面向外来文化开放的一面镜子，虽然还未放弃自身的一些惯例”<sup>191</sup>。通过研究《荷马史诗》阿拉伯译本分析西方文化的阿拉伯化过程，可有效看出阿拉伯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本土文化和未来文化相融合的具体情形。与之相当，乌普萨拉大学阿拉伯语教授拉姆塞(Gail Ramsay)之作《全球化与阿联酋和阿曼苏丹的跨文化写作》，结合 1970 年代海湾地区的不同文学现象，探讨阿拉伯文学如何面对现代性挑战问题：在作者看来，现代性在该地区激发了民族主义诉求，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表达当地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性挤压的优柔寡断和忧虑，字里行间透出对现代文明的迟疑、对西方文化没有信任感、对置身于现代性过程中的阿拉伯族裔缺乏安全感等，也因如此矛盾，在文学书写形式上发生了巨变——从遵从传统语言结构的清晰表述，转变为融进现代语言意识的表达，语法虽更明确了，但表达的所指却含混起来。不过，这些地区知识分子尝试不把现代化仅仅视作西方化，试图超越“西方文化霸权”概念来认识问题，看到了全球化作为海湾地区现代文学的创造力，生成了充满着旧与新、传统性与现代性、本土性和外来性等相互矛盾因素的现代阿拉伯文学<sup>192</sup>。

问题不限于此，1962 年第一届非洲作家大会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马克尔瑞(Makerere)大学举行——此乃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发展起来的标志，由此国际社会加大了对非洲学中的文学研究，如德国著名学者加恩(Janheinz Jahn, 1918-1973)《新非洲文学：黑人写作史》(1968)、获巴黎索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尼日尼亚著名学者约莱(Abiola Irele, 1936-)《文学和意识形态中的非洲经验》(1981)、哥廷根大学教授吉拉姆(Douglas Killam)和罗(Ruth Rowe)合作

<sup>191</sup> Bo Homberg, *Transculturating the Epic: the Arab Awakening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Iliad* // vol.3.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p.165.

<sup>192</sup> Gail Ramsay *Globalization and Cross-Cultur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and the Sultanate of Oman* //vol4.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pp.241-277.

主编《非洲文学指南》(2000)、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斯蒂芬妮(Stephanie Newell)教授主编《非洲流行小说之阅读》(2002)等，从而促使北欧学界从世界文学史观上审视非洲文学的构成及其现代意义。以研究非洲现代主义文学著称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拉森(Stephen Larsen)，其《作为一个整体的非洲文学，抑或是非洲的多元文学？——反思术语学问题》(2006)提出尖锐问题，即非洲作家创造的非洲文学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非洲文学是一体的还是分裂的？的确，共同的深肤色及其所带来的黑人族裔身份作家，在非洲沦为殖民地以后酝酿出泛非洲主义(pan-Africanism)运动，非洲文学表达了黑人认同(negritude)和呈现非洲自身传统遭遇西方现代性挤压的不满、愤懑、焦虑等：这就是统一的现代非洲文学问题。但是，西方不同国家对非洲不同区域进行不同方式的殖民，如法国在法属殖民地推行其价值观和文化体系，同化黑人精英，而英国和德国把圣经翻译成非洲方言，学校教育即使不用殖民地语言，也不培养居民非洲意识，并鼓励用本土方言写作的作家使用西方文类和审美观，使这些受很好西式教育的精英的文学创作有西方性，而非洲本土读者也认为母语文学是次级的文本：这就出现了多种的非洲文学——英语的、法语的、葡萄牙语的、本土语言的等，有的是与欧洲思想及其审美相呼应的产物。这样区分现代非洲文学，在作者看来，“似乎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思维模式，把一体的非洲各种语言文学划分为非洲各民族国家文学，而不考虑这个术语是如何解释的。目前，该研究领域正在逐步扩大而不是缩小”<sup>193</sup>。的确，从非洲文学到非洲各国文学的区分很有价值，重构了非洲文学版图，也质疑西方关于非洲文学的既定分类，使得世界文学史建构不能不关注到该地区文学的特殊情景。由此，那位劳伦森教授论文《很明亮，也许有些教育意义的某些东西：在恩克鲁玛和阿马赫期间用英语书写的加纳小说中文化层级的博弈》，清晰准确地勾画了加纳文学发展过程的特殊历史时刻，即1966年2月泛非洲主义运动倡导者的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 1909-1927)垮台，到后来成为加纳著名小说家和诗人的阿马赫(Ayi Kwei Armah, 1939-)在196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美貌者尚未诞生》(The Beautiful Ones Are not Yet Born)，这两年间加纳文学发展的杂糅性：短短几年，加纳文学异常繁荣，出现了许多著名小说家，如阿伯鲁乌(Joseph Abruquah)《传教员》(1965)和《奔流》(1968)、科纳杜(Asare Konadu,

---

<sup>193</sup> Stephen Larsen, *African Literature, or African Literatures? Reflections on a Terminological Problem* // vol.3.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06, p. 95.

1932-1994)《回来多拉》(1966)和《豆蔻年华》(1967)、谢洛尔梅(Francis Selormey, 1927-1983)《小径》(1966)、多杜(Cameron Duodu)《饶舌男孩》(1967)、阿姆(Amu Djoletto, 1929-)《陌生人》(1967)等。这些作家创作道路,无一不和西方关系密切,如阿伯鲁乌出生于加纳中部一个虔诚信仰基督教的大家庭,用英文创作,其《奔流》首版由英国朗曼公司推出;阿姆取英文名亚历山大,其作品由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推出,他编纂有《非洲大学生英语实务》;谢洛尔梅是在罗马天主教小学和圣奥古斯丁学院受教育,此后在加纳和德国研习七年体育,毕业后曾在弗朗西斯教育学院教授体育,还执导过《面向美国》和《大西洋》电影等;诸如此类的加纳精英,其文学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欧洲文学的自觉借鉴——采用有助于读者消遣的欧洲大众小说样式,而不是非洲传统文学中教诲的叙述,甚至对西方通俗小说模仿不少,减少非洲本土文化传统中的热烈、率真和教谕等情景。这样的非洲精英文学,连同期间出现的大量通俗文学,可见出现代性在加纳快速成长的趋势和模式<sup>194</sup>。与这种论述相当,乌普莎拉大学教授赫尔根森(Stefan Helgesson)《葡萄牙统治时期的现代主义:何塞·克拉维林哈和卢安蒂诺·维埃拉及殖民现代性的两面性》(2006),讨论葡萄牙人和非洲土著人所生的混血儿克拉维林哈(José Craveirinha, 1922-2003)这位莫桑比克文学大师的创作,和出生于葡萄牙的安哥拉著名小说家维埃拉(Jose Vieira, 1935-)的文学活动:和上述作家一样,他们热衷于用现代民主国家观念践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小说创作表达了对现代性在非洲成长问题的理解,尤其是从中看到“文学批评的民族范式可能是有限的”,认为现代非洲是民族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相交织、非洲现代主义文学具有后殖民批评意识、和欧洲文化构成多种方式的对话而不是对立,从而得到读者和知识界承认<sup>195</sup>。可以说,这样描述当代非洲文学,有助于重新认识世界文学构成,把非洲文学纳入世界文学框架并改变全球文学的结构。

当然,情况远比这些更复杂,因为“过去殖民权力所形成的那种文化已深深烙印在那些前殖民地的身上,其标志是毋庸置疑和无法回避的”,且影响遍及非洲各国的语言、政治制度、哲学、宗教、建筑、艺术、取名字的风俗、烹饪和文学等:

<sup>194</sup> Leif Lorentzon, “Something Very Light, Perhaps a Little Educative”: Negotiations of Cultural Hierarchies in the Ghanaian Novel in English between Nkrumah and Armah.//vol.4.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p.39

<sup>195</sup> Stefan Helgesson, Modernism under Portuguese Rule: Jose Craveirinha, Luandino Vieira and the Doubleness of Colonial Modernity// vol.4.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p.

斯德哥尔摩大学助理教授拉森的另一篇文章《欧非对话：欧洲超文本中几个非洲次文本的例子》(2006)试图运用热奈特《重写本：第二等级文学》(1982)等结构主义理论，深入到具体文本层面探讨现代非洲如何面对欧洲文化问题，揭示 20 世纪非洲作家如何借用欧洲文本所提供的思想和审美去表达去殖民化的心愿。这些人大多受西式教育并用西文创作，如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的索因卡 (Wole Soyinka, 1934-)，1954 年赴英国利兹大学英文系深造，受欧洲古典戏剧和现代戏剧的熏陶，1957 年毕业后到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从事戏剧工作，后来还以剑桥大学英语客座教授身份定期前往欧洲，1986 年入选全美文学艺术院，且用英文创作，这些成就使他成为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作家；生于科特迪瓦首府的象牙海岸著名诗人达迪耶 (Bernard Dadié, 1916-)，在塞内加尔的威廉·蓬蒂师范学校接受法语教育，此后从事与法语相关工作，其文学作品用法文书写。但是，这些作家受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观念影响，热衷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内民主化进程工作，如索因卡 1960 年尼日利亚独立后回国，开始用英语撰写戏剧、小说、诗歌及评论文章，1960 年代末尼日利亚内战爆发他参与民主运动被囚禁、流亡国外，1976 年回国；达迪耶 1947 年回国参加并领导象牙海岸的反殖民主义运动，1949 年获刑，在狱中写下政治诗集《昂然挺立的非洲》，整理象牙海岸民间故事《非洲的传说》，其自传体小说《克兰比埃》(1956)描写自己的学运经历。正因如此，拉森睿智地选择上述作家代表性文本，用世界文学史眼光审视非洲文学与欧洲文化之关系，包括：索因卡剧作《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情侣》(1973)成了用尼日利亚视野重新诠释古希腊神话的经典文本；尼日利亚剧作家罗提米 (Ola Rotimi, 1938-2000) 剧作《诸神没有过失》(1971) 活跃着被改造了的索福克勒斯剧作《厄狄甫斯王》情节，使古希腊和约鲁巴人在命运观念之间展开潜在的对话，而且在命运观念上两者尽管有相关性，但试图把古希腊的生活观和约鲁巴人的生活观合为一体是很难的，即便是有些作家热心于用前殖民地大师们所赞赏的概念证明非洲文化，但罗提米没有回到古希腊神话，而是从非洲古老历史中选择素材；达迪耶旅行见闻录《巴黎的一个黑人》(1959) 是 1 封长达 211 页的信且不知收信人的小说，是对孟德斯鸠 (1689-1755) 由 161 封书信组成的哲理小说《波斯人信札》(1721) 之讽刺性模拟；几内亚作家拉耶 (Camara Laye, 1928-1980) 小说《国王的光辉》(1954) 中，字里行间潜藏着对卡夫卡《诉讼》和《美国》、伏尔泰《老

实人》等经典文本的对话。在对这四个文本的细致辨析中可见出，非洲作家对欧洲文本有不同的反应，赋予欧洲文本以不同的新意(哪怕是同原意的相反理解)，从而在叙述中改造欧洲文本以切合自己文化的超文本现象。而且，在作者看来，“无论所论这四部作品有怎样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把欧洲潜文本运用于非洲超文本(African hypertexts)——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影响’(influence)案例。在每种情形中，非洲作者明确表达了对其所借用的欧洲文本的积极反应、发展和改造，在其中注入新意义，而不是径直反对那个原始文本。如此方式运用欧洲文本，即使是超文本也可能构成了精神上去殖民化的本质部分”<sup>196</sup>。而接受欧洲文化积极影响，不单非洲文学有深刻表现，中东其他地区亦然：波士顿大学土耳其语助理教授米卡莱夫(Roberta Micallef)受邀参与项目并提交成果《当代土耳其儿童文学的文化遭遇：是牺牲品还是主人公》(2006)，深入研究土耳其在脱离了前苏联控后、和欧盟的关系变得复杂、民族认同问题随之敏感起来等情形下，作为特殊文化场景的儿童文学发生相应变化——在多种文化组合的娱乐性叙述中表达对土耳其的想象，而且儿童文学中的这样杂糅性不是作家的选择，而是文化潮流使然，表达了对民族文化同质性的渴望，却必须面对各种情形的背井离乡或未来文化的融入<sup>197</sup>。可以说，这样个案式探讨欧洲文化作为潜文本存在于非洲-中东文学中的情况，揭示现代非洲文学和西方文化之间张力性对话关系，对重新理解现代东方文学、改变世界文学史结构等，学术价值不可低估。

同样重要的是，近 20 年来北欧学界对东亚研究，发生了从纯粹的古典东亚问题知识性研究，转向对古典文明的现代性诠释或对当代问题进行历史化的阐释、关注东-南亚文学现代转型问题，甚至把西方对东亚文学的研究，如阿杰马(Wilt Idema)和哈福特(Lloyd Haft)《中国文学指南》(1997)等，也纳入关注范围，如马悦然、罗多弼、罗斯等人现代汉学研究。由此，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教授(Marja Kaikkonen)《正在成为文学：20 世纪中国流行小说的若干观点》，查考中国古代经典“经”(canonical works/classics)“史”(histories)“子”(philosophers)“集”(collections)的制度化变化中，“集”作为一个个具体作者的散文和诗歌合成的纯

<sup>196</sup> Stephen Larsen, *Euro-African Dialogue: Some Examples of African Hypertexts Of European Hypotexts* // vol.3.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06, p.198.

<sup>197</sup> Roberta Micallef, *Cultural Encounters in Contemporary Turkish Children's Literature: Victims or Heroes* // vol.4.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p. 302.

文学(belles-lettres)变化历程：古典文学在中国主要是求真(to be true)，是对道德情景及其所引发的感觉的叙述，要求使用公共的语言-官话表述，若文学做到了这些就能履行其教化读者的职责，虽然中国古代被尊敬的文本远不限于作为文学的“集”，甚至其他文本的功能比审美的“集”更为重要；相反，若使用方言，如宋代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等通俗文本的“集”，因使用不同地方方言书写，哪怕其数量庞大也只能以口头形式流传着，并被认为是制造想象性现实(imaginative reality)，会误导读者或刺激一些人道德堕落，从而被主流话语所排斥，也不被正统文人重视，甚至被正统所放逐。然而，这种包括了小说、戏剧和故事等在内的虚构性文本(fictional texts)，在主流诗文被正统化和经典化过程中，它却因在偏离正统中包含着类似于西方虚构(fiction)诗学，超越了官学研究、正统批评体系、精英活动领域，通过文化的生产而不断创造着和维持着审美价值——中国意外地有着和现代西方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相当的文类。有意味的是，就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倡导这种虚构性文本不久，科举制被废除，扩展了中国教育的基础，让更多的人能识文断字，给通俗文本消费提供了极大的空间；1911年辛亥革命瓦解了帝制，白话汉语成为中国文字的官方媒介并影响了学校教育，让生产这种文本的作者大量增加；随后，包括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在内的各种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传统经典文学转化现代白话文学有了更多的审美资源，大众文学的合法性和质量提升都有更广阔的前景；外加知识分子不断推波助澜，如胡适之《白话文学史》、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1932年创刊号)、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the history of Chinese vulgar literature, 1938)等，从历史和理论上促使知识界投身于大众文学运动；尤其是中国社会朝着适合大众化的虚构性文本生产和消费的方向发展，如五四新文化运动、1930年代新生活运动、延安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以毛泽东延安讲话最甚)、1949年后大力发展群众文化、1980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群众文学转化为大众文学等<sup>198</sup>。这样考察中国大众文学，“为了解释大众文化的引发争论的实质，大众文化/文学不仅需要置于一般性历史框架观察，且要着重考虑精英和非精英对现代化社会的不同影响”，有效阐释逐渐却非偶然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如何从官方所轻视和不信任的文学现象，进化成一种有争议却很重要的文类，对改变认知

---

<sup>198</sup> Marja Kaikkonen, *Becoming Literature: Views of Popular Fiction in 20<sup>th</sup>-Century China* // vol.1, *Notions of Literature Across Times and Cultures*. pp.36-69

中国文学之构成的意义重大，对调整世界文学史结构的作用更不可低估。不仅如此，这位学者在本项目成果中还研究《为皇帝、民国和共产党效力的侦探》(2006)，具体研究大众文化中侦探故事(detective story)主人公形象问题。这种文体是受西方侦探小说发展起来的，是和这个中国现代化进程某些方面相关的叙述。但是，中国读者之所以青睐西方侦探类文本，是因为它包含着平等主义、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等现代性理念，这样的“侦探”角色有别于传统包青天形象，由此促使中国侦探故事的主人公从神明的判官转为有个人主义意识、按法律程序和侦探技术进行工作的现代人，哪怕跨越不同的时代，但这个不为正统中国文类所容忍的文类及其形象，却越来越受读者欢迎<sup>199</sup>。

相应的，日本文学转型及其重构问题，自然也得到当代北欧学界关注。其中，那位林德伯格教授论文《日本文学史写作：起源》(2006)在讨论明治维新出现的第一部《日本文学史》(Nihon bungakushi,1890)和《国民文学读本》(Kokubungaku dokuhon,1892)问世背景(包括日本兴起西式国民教育以替代儒学教化，传统的文献学研究让位于社会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和伦理分析等)及著作有关内容，分析西方世界及其诸多传统和概念，在明治维新的文学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并很快超过自古以来就对日本有影响力的中国和中华文明，诸如古代日本文学中时常可见孔夫子和朱熹等思想痕迹，在1870年代之后因大量翻译西方文学而迅速弱化，并被新文类中的西方思想所替代，改变了日本文学立足于东亚文明的传统构成，文学史研究也开始重视文学作品的叙述问题<sup>200</sup>。而瑞典隆德大学日本文学教授(Keiko Kockum)《日本现代小说形成中西方文学的作用》通过以下五部代表性作品及其细节，即(Nakamuru Keiu,1832-91)将英国著名作家斯密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的《1866年的自助》(Self-Help of 1866)译为《西方的成功研究》(1871)、Niwa Jun'chiro 1879年翻译了英国文学家利顿(Sir 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小说《庞贝城的末日》(1834)、著名文学家坪内逍遥(Tsubouchi Shoyo,1859-1935)出版《小说神髓》(1886)、小说家德富芦花(Tokutomi Roka,1868-1927)小说集《不如归》(1899)、田山花袋(Tayama Katai,1871-1930)私小说《蒲团》(1907)等，讨论明治以来因引进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欧美文学艺术，作

<sup>199</sup> Marja Kaikkonen, *The Detective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the Republic and the Communist Part* // vol.4.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pp.4 : 191)

<sup>200</sup> Gunilla Lindberg-Wada, *Japanese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The Beginnings* // vol.1, *Notions of Literature Across Times and Cultures*. pp.111-134.

为独立文类的日本现代小说形成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翻译或创作中对西方文本的再书写、加剧脱离中华文明和佛教文化、对西方概念进行创造性改造等，尤其是现代日本小说源于西方的影响、减弱已经是传统的中国影响，却培养了日本最初且与西方有别的小说概念<sup>201</sup>。不仅如此，瑞典哥廷堡大学日本学研究教授图恩曼(Noriko Thunman)《日本文学中的私小说》，讨论了1920年代以来日本所流行的特有文类私小说(*watahushishosetsu*)——以第一人称叙述或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纯粹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的文本，在叙述中把人从生活的不安和生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出现了田山花袋《棉被》、葛西善藏《湖畔手记》和《弱者》、志贺直哉《在城崎》、尾崎一雄《虫子的二三事》、泷井孝作《松岛秋色》等代表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西方叙述经验和来自中国的抒情传统扮演了重要角色，1920年代中期以后私小说批评话语阐述了其文类所构成的文类意识特征<sup>202</sup>。可以说，这样论述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凸显了东亚现代文学的当代性价值，从而使之能改变北欧人所建构的世界文学史观。

此外，瑞典维克肖大学(Vaxjo)比较文学教授马格瑞塔·彼得森《印度英语文学的杂糅性》，用后殖民批评眼光讨论现代印度文学的杂糅性及其形成过程，以及印度文学传统的确定性特征在印度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被后殖民历史、种族意识和民族融合诉求、民主化和现实复杂性等所消解，并出现了新文类、新叙述内容和叙述方式等杂糅情况，而杂糅性和确定性因太多意识形态内容和意义差别而难以用来作为诠释的手段，当然在全球化文化融合意义上，杂糅性消除了文化的地方差别，从不断变化中看到难以阐明的全部文化特征，它需要更多的经验主义和理论探查<sup>203</sup>。这样看待印度现代文学，有助于增加世界文学史进程中的印度因素。更有甚者，斯德哥尔摩大学戏剧研究副教授雷根(Christina Nygren)在此把中、日和印的戏剧纳入世界文学史框架：《为了学习和娱乐的戏剧：比较视域下的日本、中国和印度》讨论西方戏剧理论和中、日、印的传统戏剧接触时需要修改的问题。中国宋元南戏、杂剧、明清传奇、清代地方戏及近现代戏曲等，或印度的梵语剧、泰米尔剧、孟加拉语剧、印地语剧，或日本“能”、“狂言”和“歌舞

<sup>201</sup> Keiko Kockum, *The Role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Japanese Novel* // vol.3.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2006, p. 97-140..

<sup>202</sup> *The Autographical Novel/Short Story Watahushishosetsu in Japanese Literature* (Vol.2:52)

<sup>203</sup> Margareta Petersson, *Hybridity in 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 vol.4.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pp.80-117

伎”等古典剧，它们注重戏剧表演中的艺术因素，而不是戏剧演出开始阶段的基本观点，而且这些传统戏剧中的悲剧、喜剧和闹剧是混合的；能剧、南戏和元杂剧、梵语剧等具体文本显示出，东方戏剧中情感熏陶和说教是相交织、艺术形式丰富性和功能多样性相一致的，如日本剧更适应于演员的表达而不很重视文学性，演员和观众都需要体验性的支持，这就决定了文本在结构上的重要性不是上演故事，而是怎样展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这种情况和中国戏曲相当，且展示过程都没有现实主义需求和期待，观众关于戏剧表演的认知也不是要探求对现实的理解——因为戏曲知识是程式化固定下来的；表演过程中艺术和美皆围绕中心角色展开，不过表演角色在京剧中有旦生之分、在能剧有主角和次角之别、在梵语戏剧中男演员都是同等的重要，不过在中国观众是听戏、日本观众看戏、印度则是听看结合的最高享受。如此研究东亚-南亚戏剧，发现这种情形连同东方戏剧表演理论和亚里士多德戏剧观或古希腊戏剧表演说法不尽吻合，有力说明了要完整理解一部戏剧要全面解读表演，而不能套用西方戏剧概念<sup>204</sup>。而其《欧洲戏剧在日本、中国和印度的那用》讨论东-南亚三国在现代转型问题上的异同——欧洲戏剧进入这些地区，促使各自戏剧从传统戏曲转化为现代戏剧，如中、日都出现话剧，印度地方语言戏剧也话剧化，但各自现代化进程所碰到的文化碰撞和冲突具体情形不同，使得对欧洲戏剧的改造也各异，如在日本西方戏剧之引入是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并促进了民主理念之建构，而在中国是提倡进步和现代化的政治工具，之后为革命服务，至于印度是用来提升抵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能力，但无论哪种情况，借用欧洲戏剧在各自现代化过程中皆未延续更长时间，并被颠覆性的意识形态所利用，它在大众文化语境下显露出生命力旺盛是因本土传统而不是东西方文化冲突，但因此促成政治和社会情势的变革<sup>205</sup>。可以说，这样审视东-南亚戏剧转型情况，揭示出中、日、印的现代戏剧生成和从欧洲传输来的戏剧并非完全对应，这也意味着不能用西方戏剧观念定义东方戏剧，同样，世界文学史中也就必须专门考虑东方戏剧。

总之，瑞典国家学术委员会项目“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和文学史”及其四卷本成

---

<sup>204</sup> Christina Nygren, *Drama for Learning and Pleasure: Japan, China and India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 vol.2. *Literary Genres: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pp. 155

<sup>205</sup> Christina Nygren, *Approach of European Theatre in Japan, China and India//Vol.4, Literary Interac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2*, pp.199-240.

果《文学史：全球视角》显示出，北欧学界在全球化时代正着力改变欧洲传统的世界文学史观：东方不同区域的“文学”得到了广泛的清理，呈现出每种文学的不可替代性，客观上打破了世界文学史构成一定只能根据西方文学观的标准；西方当作区域性问题的东方文学，北欧学界因为在世界文学史结构中重新使用欧美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布朗(E.Browne)四卷本《波斯的文学史》

(1902-1924,1959,1968——不断再版)、瑞 尔卡(Jan Rypka)《伊朗文学的历史》(1968)等，用后殖民批评眼光重审了西方关于东方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法国人期望过去法属非洲人具有法兰西意识，从不认可其本土文学)，从而在怀疑西方中心论的根据以后，使东方文学越来越获得相应的位置，使西方对阿拉伯-非洲文学、南-东亚文学等进行地域化研究的成果及其意义得到了重新理解；在专门论述东方不同区域的文学现象中提出了东方文学独特性的判断，如彼得森在第 2 卷总结文章《关于文类和文类理论的独断论视角》所说，对人类交往的现实生活之传统理解哪怕逐渐让位于语言学和相关学科的判断，但口头文学时期的说者/作者试图给听者/读者以其他所期望传达的内容，即使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语言交流行为曾过于理想化，但世界文学史建构过程应充分考虑口头文学作为一种古老范式的作用，此外东方各地各有自己的文学，在文化上都拥有自己的文本类型，如中国的赋、骈文和词等称为“文体”(wenti)，西方“诗”(poetry)和中国“诗”(shi)在文类上有诸多差别，尤其是东方各区域文学概念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这些情形显示出西方学者把东方文学史建构成一系列特殊叙述的局限性(不管它是扩散性叙述，还是文学进化性叙述，抑或多文化/杂糅状况的复杂性叙述)，冲击着现代西方文类概念和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文类术语，需要对文类进行跨文化描述(transcultural description)方可澄清，而现在的研究不是单纯地解决文学史的书写问题，而是试图通过阅读近几个世纪来和历史语境相关的文学和文学史，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探求东方文学，改变既有的叙述范式，表达不同声音和区域中某些可能性的东西，改变西方人文学术范式之不足<sup>206</sup>。而且，所有这些尝试、考虑，在实践层面上都借助“翻译”——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东方文学许多作品被翻译成了北欧语言，也因为这个奖是在用西方文学概念诠释所译作品的基础上

---

<sup>206</sup> Anders Pettersson,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on Genres and Theories of Genre* // vol.2. *Literary Genres: An Intercultural Approach*, p.279-305.

操作的，习惯上就很少从理论上考虑东方文学诗学：这次项目成果就试图修正西方的诗学标准，“翻译”在此成了一个重建世界文学史结构的关键性问题——经由翻译看到了文学在文化认同上的相对主义和审美诉求上的普遍主义。全球化作用和学界的努力相配合，出现诺贝尔文学奖关注东方的比重大为提升、中国和东方更多文学作品被译成北欧语言、汉学研究和亚洲研究机构大量增加，东方文学也因此被赋予世界意义。